

学术思想 评论

贺照田 赵汀阳 主编

第二辑

辽宁大学出版社



学术思想评论

(第二辑)

主编 贺照田 赵汀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术思想评论 第二辑/贺照田, 赵汀阳主编, 一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 9

ISBN 7-5610-3476-8

I. 学… II. ①贺… ②赵… III. 学术思想-发展-研究
N.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7090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邮编: 110036)

金城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400 千字 印张: 16.875 插页: 4

印数: 1—3500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责任校对: 东 雪

封面设计: 大 斋

定 价: 23.00 元

为了学术与思想的深化

季羡林题

目 录

学术现象论析

——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一）

- 何怀宏 一个问题的变迁
——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谈起 （3）
- 孙 歌 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 （16）
- 邓正来 深度研究与自主发展
——以对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为个案 （31）

专 题

——理想的当代文学批评

- 史铁生 无病之病 （50）
- 韩少功 有生命的萝卜 （54）
- 萧 元 逻辑中的道德与道德中的逻辑 （57）
- 陆健德 “人文精神”？
——批评的贫困 （62）
- 肖开愚 文学批评，关于文学的文学 （73）

- 陈 超 谈诗论方法的颠倒 (78)
洪子诚 批评的“立场”断想 (84)
郭宏安 文学批评断想 (92)

学者访谈

- 韩林合 “学至乎没而后止”
——陈启伟先生访谈录 (115)
钟 焱 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
——朱学勤先生访谈录 (133)
李志清 现代诗：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
语的特殊“知识”
——陈超先生访谈录 (151)

阐释与分析

- 朱苏力 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价
——《法律的文化解释》读后 (167)
张志扬 现代学的重审与重建
——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的意向性分析 (187)
曹卫东 哈贝马斯：认同与差异 (237)
刘 奔 枯根岂能“发新芽”？ (261)
康德/何兆武 论优美感与崇高感 (279)

学科与学术史

- 徐友渔 新儒家与康德
——评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和超越 (336)
- 干春松 从“良知坎陷”到“理一分殊”
——新儒家文化立场的矛盾与转折 (357)
- 曹意强 “包罗万象史”和西方艺术史的兴起 (369)
- 程光炜 朱光潜《诗论》的当代诠释 (389)
- 林成琳 技术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 (406)
- 陈 康 (遗文四篇)
 恢复固有道德问题 (421)
 教的问题 (428)
 闲话人生 (433)
 略谈黑格尔 (442)

术语精义

- 尚 杰 “延异”及文字学的“相似家族” (446)

序·跋

- 林毓生 试图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
——《热情与冷静》序 (453)

傅璇琮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序 (475)

学术经验

张志扬 问题与思路
——一种注意链的现象学描述 (483)

学术现象论析：

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一）

编者按

据我们观察，“学术规范”议题之所以在学界引起普遍共鸣，是因很多人把它当作了有外在形式标准的严谨学风的时代提法；“问题意识”被同样多的人挂在嘴边，则是因这一提法的倡言者的深层意蕴迅速地被这些人用自己旧有的构置问题的习惯消埋掉了。于是新说文饰旧法，何乐而不为。结果，“学术规范”和“问题意识”成为不少人新一轮的外包装，引文和参考书目大大增加了，论证的问题却仍是老路——或产生于未经置疑检讨的已有学科构架下的原有习惯思路，或产生于未经起码调适修正的对西方流行理论和学术运作模式的机械拟仿。记得葛兆光先生曾在去年一个会上以当代中国古典文学领域中有关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为分析个案，发现其中绝大多数研究的思路都为我们通行的文学史架构模式所左右，于是葛先生发言题目便慨乎言之：“问题：没有问题。”一语击中我们大多数文史哲研究专著和专论的要害所在。本辑讨论中邓正来先生的《深度研究和自主发展》一文，则以澳门社会科学研究为分析对象，指出由于对西方实证主义科学观及其相关的方法和概念缺少足够的反省，使得我们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最后都陷入了“丢失了原本试图研究的对象”的困窘境地。此种学术现实深究起来都和我们的“问题”质量亦即我们的

“提问”能力有关。因为一个被确定的学术问题已经规定了研究论证的路向和此研究可能蕴蓄的认知贡献的范围。所以缺少对学术问题发现与提出这一动态过程的自觉考察,是导致我们时代学术缺少新认知层面的提供和新认知角度的发现的首要原因。

研究是否合乎规范解决的是学术职业道德和判定研究合格与否的标准问题。提出“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来讨论,关注的则是当下由于“问题”能力不足导致的学术研究认知价值过低的现实。而一个研究者良好的“问题”能力首先需要贴近自己研究的反省运思习惯的养成,和研究者不断地对自己的这种反省运思能力加以自觉的训练。

本栏的三篇文章是三位作者从各自的研究出发所提供的思考,希望它们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使“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引起大家的兴趣。我们希望更多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加入讨论,甚至争议和辩难,以使一学术问题得以最后形成的诸有关因素都能得到探讨,从而揭示不同学术问题的复杂性和共通性。我们也非常希望这次讨论能提供一个由外向内的契机,即在材料、知识、学理和研究范式被充分关注后,学界能转而关注一个范式要被成功应用时研究者应具备的能力品质,他欲充分驾驭所掌握的材料、知识和学理、范式时他应需的能力品质,和他自己欲开创一个新的研究范式时所需的能力品质和创造意识。

我们期待着讨论的扩展和深化。

何怀宏

一个问题的变迁

——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谈起

—

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用有关这个问题的一本书的编著者白钢的话来说，过去也叫做“长期停滞”或“长期迟滞”的问题，是与西欧诸国的封建社会相比较而提出来的。^①白钢认为，一般说来，西欧诸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从蛮族的入侵造成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 476 年）算起，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公元 1640 年）为止，总计不过存在了 1164 年；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如果从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 475 年）算起，到鸦片战争的爆发（公元 1840 年）为止，前后却延续了 2135 年，差不多相当于西欧封建社会的两倍。因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说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比西欧诸国长，并且没有像西欧诸国那样迅速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问题。甚至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也是由西方人确立的，最早提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的人，是 18 世纪 70 年代英国工场手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②

白钢指出，有关这个问题讨论，如果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正式把它提到中国史坛上来讨论算起，已有

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在半个多世纪中，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在国内的讨论，几起几落，曾经吸引不少人的关注和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大致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争论，“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是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中附带提出的。由于这一论战是有政治背景的，因此，关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问题的论争，也不是单纯的学术之争。第二阶段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建国以前，此期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长期停滞论”提法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因此，讨论中，有的改称“发展迟缓”，有的改称“发展阻滞”，有的改称“发展迟滞”。50年代到6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特点是大家都明确地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讨论文章明显地较前两次增多，而且普遍注重史、论的有机结合，形而上学的方法已为论者所不取，在这方面老一辈的史学家起到了示范作用。然而，在讨论过程中，基本上处于各说各的状态之中，彼此之间缺少交锋，没有四十年代的那场论战那样活跃。1978年到1982年则为第四阶段。截至1982年10月底，粗略统计，关于这一课题的文章和专著的数量，总计约在二百篇（种）以上。

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也说：在有关中国历史的各种问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三千年之久，很少有其他的问题能像它那样有长远的魅力。^⑥他们认为，应该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从仅仅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方法中摆脱出来，而从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角度亦即从社会结构的特点出发，重新探讨这一古老的难题。从控制论角度来看，所谓某一社会的停滞，就是指这个大系统的结构有着巨大的稳定性。控制论不是从不变性来讨论稳定，它不是去追溯那些使事物及其关系保持不变的因素。恰恰相反，它从揭示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相互调节、相互适应的动态角度来考察系统的稳定性。有鉴于此，他们对“中国封建社

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超稳定系统”的解释，所谓“超稳定系统”，就是说它一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荡，也就是说，这种系统的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金观涛、刘青峰后来又在《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回顾他们的这一研究说，他们发现，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可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体化，就造成社会演化呈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新结构难以在旧组织中成长壮大，旧社会结构瓦解后又会再次修复，社会演化呈一种奇特的动态停滞，这就叫“超稳定系统”。这种组织方式造就了中国古代盛大辉煌持久的文明，但社会进步的积累又为周期性大动乱所中断。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中国也就从先进转化为落后。^④在《开放中的变迁》中，他们进一步把“超稳定系统”的基本结构放到对外开放条件下去考察，认为近代中国典型的行为模式已不是王朝周期性的崩溃与修复，而表现为“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的三部曲。而在与世隔绝条件下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更换意识形态，并再次出现与传统同构的一体化结构，都是“超稳定系统”基本组织方式的表现。

然而，在1989年，何兆武在《百科知识》上曾发表一篇文章，认为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论”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首先，这里所谓的“长期”或“停滞”看来是以西欧的发展速度作为一个标准尺度的，而西欧只是一个特例，只是人类数十种文明中的一个特例。所以，要使“中国封建社会为何如此之长”的假问题转化为一个真问题，就只有把它转化为如下的提法：中国的发展为什么较西欧为缓慢，也就是，西欧的发展为什么较

中国（事实也是较所有的文化）更为迅速？假问题往往带来许多无意义的答案。何兆武指出，在探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时，有的意见认为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长期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但是否西欧的封建主就比中国的来得仁慈和宽厚一些呢？而常见的一种自相矛盾就是，同一种理论既认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停滞不前，又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规模之大和频率之高远远超过西欧，封建社会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极其迟缓呢？^⑤

龚小夏在1993年的一篇笔谈中又重提了这个问题，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长”的问题是一个论断，而不是一个合格的学术问题。首先，中国是否肯定有典型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它的上限和下限在什么时候，都是还在讨论中的问题；其次，所谓“封建社会”是否“长”，本身又是个没法界定的问题。她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非经验的、非实证的，因而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她认为社会科学要关心事实而非价值判断，经验性观察和研究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认为各种价值体系都有自己独特的合理性，社会科学要研究可以回答而不是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而可以回答的问题主要就是那些关于事实的问题。作者看来认为，那些太大的，无法解决（指无法实证地予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真实的问题。^⑥

对一个复杂的大问题究竟是属于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剥离。“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停滞不前”的提法明显带上了一个时代的痕迹，过多地受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但是，在这个问题中，应当说还是包含着某些真实的因素，近数十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仍然能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它在这些年中也确实吸引了一些第一等的人才（虽然也有一种潜在的压力）。在这个问题中，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相

当多的学者都会同意，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相对来说是没有巨变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相对来说自成一个单元。这一说法也是可以得到大量史实支持的，那么，对这种长期不变及其原因的探讨就仍然是有意义的，这样，关键的、可以质疑的就主要是使之基本不变的原因又是什么？或者说有那些因素造成了这种状况？

另一方面，只是使用这一讨论中那些既定的概念来解释丰富的中国历史，显然是不够用了，而且其过于政治化的前提也容易扭曲历史，我们不仅对作为其前提的“五阶段论”需要质疑，还需要质疑那种认为中西皆同的、铁定的客观规律的观念，乃至对历史的线性进步观念也需要反省。所以，特定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讨论确实应当告一段落了，或者说，不宜再按老样子继续下去了。我们需要在以前讨论的基础上作某些转变，比方说，与其泛泛地依照某些概念总结历史，不如具体地去探讨各种专门史以及更具体的问题。当然也不宜走到另一个极端，不宜完全否定提出大的解释框架的努力，还是应当鼓励那些谨慎的、依据史料的不同解释框架，因为，如果完全否定去尝试新的解释框架，实际上往往就是只让目前流行的单一的解释框架继续唯我独尊，自我阻塞学术发展的道路。

二

我们今天已经相当习惯了便捷地以“封建社会”的模式解释中国近两千多年来的社会历史，以“封建”指称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基本性质和主要成分，不假思索地使用“封建专制”、“封建大一统”这样一类字眼，而并不思考这样的语词组合从其本义来说是自相矛盾的，^⑦“封建社会”的模式成了解释中国历史占主导地位的模式。虽然近十年来大陆亦有一些学者开始相当谨慎地使用

或不用这类概念，甚至尝试提出新的解释范畴。^⑧这类概念还是不仅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为诸多部门和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学校所共享，也在相当程度上仍为文化学术界具有不同甚至对立思想倾向的学者所共享。

我曾经在《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一书中指出：“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显然是相当晚近才出现和流行的一个概念，其在目前含义上的论定迄今不过五六十年，总之，它是一个相当“现代”的概念，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解释相当不同乃至对立。^⑨古人认为“封建”盛于周代，至秦帝国建立，“封建”即已废除而改行中央集权的“郡县”；而持“封建社会”说的郭沫若一派则认为春秋以前是“奴隶社会”，战国至秦正好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开始，其它如“西周封建”、“魏晋封建”等派虽把封建社会的上限或者提早到西周，或者推迟到东汉、魏晋，但都肯定晚清以前一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封建社会”，因为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是变形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前，必须上接一个“封建社会”，否则就不符合社会由“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规律和客观必然性，就无法解释中国革命首先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对象。习惯的思路大致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怎么可能不是封建社会？如果不是，岂不意味着社会发展阶段模式和规律甚至于唯物史观的失效？如果不是，这场革命要依靠谁，联合谁，反对谁，夺谁的权，革谁的命岂不是没有着落？这一思路渐渐成为一种潜在的但却公认的前提，它并不总是出现，因为它已经变得毫无疑问。

“封建社会”的模式是在二十世纪这一动员和革命的时代提出来的，而这一时代越来越显示为仅仅是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移的过渡时代。北伐时期革命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封建军阀”，“反封建”首先是指“反军阀”。^⑩这时所指的“封建”还主

要是从政治上层的角度观察，所说的“封建军阀”中“封建”之义与古人的“封建”亦无大的违拗，虽然失去了“亲亲”色彩，却可以类比于比方说唐代的藩镇割据，是与中央集权、大一统相对而言的“封建”。国民党领导的北伐战争首先是指向国家统一，基本上没有广泛地触动社会下层，未变革农村的土地关系。而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打倒军阀”就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把农村中的“地主”、富户列为革命的对象。而革命的主要对象由“封建军阀”向“封建地主”的转移也意味着观察角度从政治向经济、从社会上层到整个社会的转移。“封建地主”的概念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封建社会”的理论已经呼之欲出。郭沫若在1930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明确地抛弃了“封建”的古义，提出了以地主与农民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对抗为基础的新的“封建社会”的概念，这一概念经由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则成为定论，在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动员群众参与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最后夺得政权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1949年以后与旧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继续革命”中也依然发挥着生动、持久的效力。

“封建社会”模式的政治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其学术意义则主要在于把中国的学者注意力引向社会的经济层面，引向被统治的下层，而这一向是中国传统学术比较忽略的方面。所以，它确实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历史上一向被忽视的社会下层人们的历史，研究“除去了政治的历史”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由于它极强的政治目的性，又由于它是在革命战争或准备战争的时期作为动员大众的工具相当仓促地提出来的，它就不能不具有很强的工具特点和批判否定的色彩。由于号召要推翻“三座大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几乎被看成一片黑暗或至少相当阴暗。而当今天社会已脱离动荡的过渡时期而进入一个较为和平安定的时期，人们的心态也由造反转为建设，就不能不对以前激烈地反对传统和非难历史的看法有所修正。但问题还在于，这种